

有形与无形的手之争

[美]约翰逊 著  
安佳 肖遥 译

# 政府到底 该干什么

云南教育出版社

07  
政府到底该干什么？  
——有形与无形的手之争

〔美〕 查尔斯·约翰逊 著  
安佳肖遥 译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0

##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通产省这个典型，分析了日本政府如何借助其独特的经济官僚体制，通过产业政策、行政指导等方式对经济进行有效干预，从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本书结论是，政府的供给管理与产业政策是日本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本书出版后，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公认此书独树一帜，而且此书的出版竟引起美国工商业界的深刻反省，有力的促进了美国产业政策的调整。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应广泛参考各国已走过的种种道路，日本政府的经济组织方式以及在指导性计划、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解决当前中国经验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诸多棘手问题，特别是政府如何治理经济的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本书行文生动活泼，史论结合严密。适合政府官员、经济研究和工作者及关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者阅读。

责任编辑：王然

封面设计：沈防

政府到底该干什么？

有形与无形的手之争

〔美〕约翰逊 著

安佳 肖遥 译

---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防化研究院印刷厂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千

1989年12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1,300册

---

ISBN 7-5415-0273-1/D·2 定价：4.50元

##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的“奇迹”	( 1 )
第二章	经济文官制	( 30 )
第三章	产业政策的提出	( 75 )
第四章	经济参谋部的产生与发展	( 96 )
第五章	从军需省到通产省	(128 )
第六章	高速增长时期的体制结构	(168 )
第七章	行政指导	(202 )
第八章	国际化	(229 )
第九章	日本模式	(257 )
附 录	通产省1925—1973年的内部结构	(274 )

## 第一章 日本的“奇迹”

日本人认为，日本的奇迹首次出现于1962年。1962年的9月1日和8日，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分2次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正视日本》。稍后，该文的单行本出版，并很快译成日文在东京发行，书名为《惊人的日本》。在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成就，经济学家们和学者们仍然在撰文批评时政，预言繁荣将衰退、危机将来临，他们担心的是不合理的预算、巨额贷款以及庞大的国内需求。然而，《经济学家》杂志所称道的却正是庞大的需求、高生产力、和谐的劳资关系和极高的储蓄率。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日本朝野及全世界对战后日本经济的注目，也由此激起了人们探求日本经济奇迹的兴趣。

下面是奇迹本身的一些详细数据。表1以1975年为100，表示了从1925年到1975年的工业生产指标，这张表显示了几个有趣的事实。从表中看到，奇迹在1962年才刚刚开始，当时的工业生产品额仅为1975年的 $\frac{1}{2}$ ，一半以上的日本经济力量直到1966年后才开始显露出来，这张表还清楚地显示了1954年、1965年以及1974年的经济衰退。正是这几次衰退，促使日本政府采取了更具创造性的做法，事实也证明，日本经济从衰退中复苏后，较以前更为强劲。表中还可看到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例如石油取代了煤后，矿产业开始衰落，纺织业的地位由机械与钢铁制造业所取代。这种现象，日本人称之为“重工业化”（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ialization）。

如果我们采用不同的基数，例如，我们以1951年至1953年的

表1 工业生产指数(1926—1978)

年份	制造业										食品	
	综合产业	公用事业	矿业	有色金属	金属制品	机械	水泥	化工	石油煤制品	纸张		纺织
1926		2.5	54.5	1.5	4.0			1.5	0.7	4.9	17.4	
1927		2.8	59.7	1.7	4.1			1.7	0.8	5.3	18.8	
1928		3.3	62.0	2.0	4.6			1.8	1.0	5.8	18.1	
1929		3.6	63.2	2.2	4.6			2.2	1.0	6.4	18.9	
1930	5.5	3.9	62.0	2.1	4.3		1.4	2.5	1.0	5.5	21.8	15.8
1931	5.0	4.0	68.8	1.8	4.4		1.1	2.6	1.1	5.3	23.0	15.2
1932	5.3	4.3	60.0	2.3	4.9		1.0	3.2	1.2	5.3	24.9	16.0
1933	6.4	4.9	68.6	3.1	5.7		1.4	3.7	1.4	5.8	28.6	18.8
1934	6.9	5.3	75.1	3.7	5.6		1.4	4.3	1.7	5.4	31.5	24.0
1935	7.3	6.0	81.0	4.4	6.7		1.4	5.2	1.8	5.9	33.4	26.4
1936	8.2	5.5	89.6	7.8	7.4		1.7	6.2	2.1	7.0	35.8	27.6
1937	9.6	7.1	97.5	9.2	8.7		2.3	7.1	2.5	8.0	40.8	27.9
1938	9.9	7.7	103.3	9.4	9.1		2.5	8.1	2.7	7.2	33.6	27.5
1939	10.9	8.1	108.8	10.5	10.3		3.1	8.6	3.2	8.3	33.6	32.2
1940	11.4	8.3	115.7	11.0	10.1		3.8	8.5	3.4	8.3	30.4	26.8
1941	11.8	9.1	117.1	11.3	9.6		4.4	8.5	4.0	8.5	24.6	33.5

续表

1942	11.5	9.1	12.0	114.4	11.0	7.9	10.9		4.5	10.8	7.1	4.0	6.7	19.5	31.7	17.5
1943	11.7	9.2	12.1	115.5	11.1	8.9	13.3		5.0	9.6	6.1	4.0	5.7	12.7	28.0	14.5
1944	11.9	9.0	12.4	105.1	11.4	8.3	14.7		5.8	7.5	5.7	3.2	3.3	6.8	24.8	11.9
1945	5.2	5.4	5.3	55.5	4.8	2.9	5.5		2.5	2.9	2.3	0.9	1.6	2.6	14.8	7.9
1946	2.3	6.9	2.2	40.9	1.8	1.0	2.9		0.8	3.1	1.4	0.4	1.7	4.3	22.7	7.0
1947	2.9	7.8	2.7	54.0	2.3	1.3	4.0		0.9	3.8	1.9	0.5	2.4	5.8	29.9	6.3
1948	3.8	8.5	3.6	66.2	3.0	2.1	5.5		1.4	5.8	2.5	0.8	3.5	6.6	34.7	7.7
1949	4.8	9.6	4.6	75.7	4.0	3.7	6.3		1.7	7.6	3.5	0.9	4.9	8.9	34.8	11.7
1950	5.9	10.3	5.7	80.0	5.1	5.1	7.3		1.8	9.0	4.7	1.7	6.7	12.6	36.5	13.1
1951	8.0	11.0	7.8	91.4	7.1	6.9	8.8		2.9	12.5	6.3	2.8	9.1	17.9	54.7	16.8
1952	8.6	11.9	8.4	94.4	7.7	7.1	9.3		3.0	13.0	6.9	3.6	10.4	20.3	58.2	17.2
1953	10.4	12.7	10.2	101.2	9.5	8.4	9.9		3.8	15.4	8.6	4.6	13.3	24.4	55.7	26.3
1954	11.2	13.5	11.1	97.5	10.4	8.8	11.5		4.3	17.5	9.8	5.4	14.5	26.5	54.6	28.5
1955	12.1	14.5	11.9	88.0	11.3	9.8	12.2		4.3	17.7	11.3	6.2	16.6	29.6	54.4	30.3
1956	14.9	16.7	14.6	108.3	13.9	12.0	14.7		6.2	21.5	13.6	8.0	19.2	35.2	60.8	32.0
1957	17.3	18.6	17.3	119.3	16.5	13.6	16.4		8.7	25.3	16.0	9.6	21.7	38.9	64.1	30.7
1958	17.4	19.7	17.3	115.7	16.6	12.8	16.0	15.6	9.3	23.9	16.0	10.0	21.3	34.8	61.8	35.6
1959	20.9	22.6	20.8	114.6	20.1	17.0	21.0	19.2	12.0	28.3	18.5	12.4	27.9	40.6	65.9	37.7
1960	26.0	26.5	25.9	125.2	25.3	22.4	27.8	24.4	16.5	25.7	22.3	15.8	33.6	47.9	73.2	39.9

续表

1961	31.0	30.8	31.0	134.0	30.4	28.3	33.3	28.8	21.4	41.5	25.5	19.0	40.5	51.7	77.5	43.1
1962	33.5	32.9	33.6	137.0	32.9	28.3	32.5	30.3	24.0	45.3	29.2	21.4	43.4	54.5	79.3	46.6
1963	37.3	36.0	37.4	135.9	36.7	31.9	37.2	34.0	26.5	48.1	32.2	25.6	48.0	58.6	83.8	57.8
1964	43.2	40.6	43.3	137.1	42.6	39.7	45.6	39.6	32.3	55.5	36.6	30.3	54.5	64.8	88.9	62.7
1965	44.9	43.3	44.9	135.2	44.3	40.8	45.3	40.5	32.8	57.1	40.1	34.8	55.7	69.4	90.0	66.7
1966	50.7	47.6	50.8	143.1	50.2	47.2	51.0	48.0	38.1	62.2	45.3	40.0	62.5	76.4	95.4	73.1
1967	60.7	54.0	60.7	141.0	60.2	61.1	61.6	58.6	49.6	72.8	53.0	48.1	69.6	83.3	102.5	76.8
1968	69.7	59.6	70.1	142.1	69.6	68.4	74.3	71.0	61.5	81.4	62.6	56.9	76.9	88.4	107.0	78.7
1969	80.7	67.0	81.3	142.9	80.8	82.6	86.6	84.0	74.8	90.3	73.7	67.9	86.6	97.0	113.9	83.6
1970	91.8	75.9	92.5	139.2	92.2	94.2	93.8	96.9	87.8	101.0	86.8	79.8	98.2	105.2	118.7	89.9
1971	94.3	80.6	94.9	131.6	94.6	91.2	95.7	100.1	89.8	102.6	91.6	87.4	100.6	109.4	117.1	92.6
1972	101.1	87.4	101.8	121.9	101.6	98.7	108.4	111.0	87.3	109.5	97.2	91.5	106.7	110.8	120.7	97.8
1973	116.2	97.4	117.0	112.8	117.0	118.8	128.6	133.4	117.4	126.5	110.2	106.6	119.3	118.5	122.1	98.6
1974	111.7	97.3	112.3	105.8	112.4	116.9	112.6	123.0	116.2	117.0	109.9	104.4	113.7	106.1	109.1	97.5
197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9.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76	111.0	108.5	111.1	100.0	111.2	109.5	119.3	116.8	112.7	110.4	111.5	102.7	113.3	108.4	106.8	101.1
1977	115.6	113.7	115.7	103.1	115.7	108.1	125.0	124.9	121.3	115.3	117.2	104.7	115.3	106.7	104.4	104.6
1978	122.7	119.9	122.8	105.9	123.0	110.1	1315.0	134.9	131.5	121.0	131.0	104.0	102.8	107.7	107.0	106.1

资料来源：每日新闻社编《昭和史辞典》每日新闻社，1980年，第457页



指数为100；那么，日本1934年至193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为90；1961年至1963年为248；1971年至1973年增至664。而1934年至1936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87；1961年到1963年为400；1971年至1973年则高达1350。因此，日本战后经济从1946年到1976年，增长了55倍。象日本这样一个国家，面积只占地球表面的0.3%，却占有世界经济活动的10%，并养活了世界8%的人口，不论你是否认为这种成就就是一个“奇迹”，日本的成就确实值得研究。

在本书之前，已有很多著作专门探讨了日本经济，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各家的论述。在各种论述中，“奇迹”一词经常用到，但“奇迹”并不仅仅用来解释和意指1955年开始的高速增长。早在1937年，年轻的教授有泽应已就曾经使用“日本奇迹”来描述1931年至1934年的81.5%的日本工业增长。有泽应已是战后日本工业政策二三十个主要策划者之一。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奇迹”的发生是由于当时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采取了货币管制、赤字财政等政策带来的。81岁的高桥是清曾经打算停止这种政策，因而在1936年4月26日的清晨被年轻的军官暗杀了。

这种早期的奇迹使学者们深感困惑，西方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指出：日本在没有凯恩斯革命的1932年就采用凯恩斯政策，这是一个谜。某些日本人却并不关心这个谜，他们认为事情很简单，他们把高桥是清称为“日本的凯恩斯”。在本书中，我希望读者们了解，高桥是清和他的政府同僚在政策形成的年代得到过许多经验教训，因此才有比凯恩斯主义更强调政府干预的政策形成，这与西方众所周知的政府财政政策的形成是毫不相同的。

金德尔伯格的“谜”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日本经济奇迹；众多的研究者在探求奇迹时，通常用英美国家的观念、问题以及经济行为规范来解释日本的现象。对这些研究者来说，研究的价

值取向是自己的国家，他们的研究目的并不在于解释日本的经济活动（虽然也有人概括出了一些日本的规律），他们的目的，是借用日本的成就来反映自己国家的得失，或者是对日本人在世界各地扩张的可能性提出警告。甚至象前述《经济学家》在1962年发表的那篇有名的文章，其作者的真正目的，也是在考虑“日本能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与《经济学家》之文相类似的，还有拉尔夫·休因斯的《创造日本奇迹之人》（The Japanese Miracle Men, 1967, Ralph Hewins）、P·B·斯通的《超前之波：日本奇迹的故事》（Japan Surges Ahead: The story of an Economic Miracle, 1969, P. B. stone）、罗伯特·吉兰的《日本的挑战》（The Japanese challenge, 1970, Robert Guillain）、赫尔曼·卡恩的《日本超级大国的崛起》（The 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 1970, Herman Kahn）和黑肯·赫德伯格的《日本的反击》（Japan's Revenge, 1972, Hakan Hedberg）。在这些“日本热”的作品中，最有名的是埃慈拉·沃格爾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ns, 1979, Ezra Vogel）一书，在本书中，沃格爾呼吁美国人应学习日本人的长处，而不仅仅是分析日本奇迹的原因。我在本书中，不打算象早期的那些书那样，鼓动大家移植日本的制度；我要将日本经济机构的复杂性描绘出来，使那些热衷于采用日本制度的人知道，施行日本经济制度所要付出的代价。

对于日本奇迹的完全不同的解释主要来自社会经济学家，有时我将其称为“对于日本奇迹来说，除了政治以外，什么都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这个学派可细分为四派；这四个学派虽然经常相互交叉重叠，但其验证的目的却明显不同。第一派主要是人类学家，他们喜欢用“国民性、基本价值和共性”进行分析；第二派是经济学家，他们以“没有发生奇迹”来分析日本经济；第三派以学生为代表，他们从劳动关系、储蓄率、企业管理、银行

体系、福利制度、一般贸易结构和日本机构方面来分析日本的“独特的经济结构”；第四派认为日本奇迹是“搭便车”（free-ride）的结果，这种方法强调日本的奇迹是战后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部分。对于上述四派的研究，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是，我认为他们忽略了关键所在，没有分析政府政策的效果，也没有给予通产省及其产业政策以应有的注意。

用“国民性”解释日本奇迹的人认为，日本经济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日本人有一种独特的、来源于文化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从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来，例如：低犯罪率、个人对团体的顺从、强烈的爱国心以及经济事务上的表现。对经济生活影响最深的文化贡献恐怕就是日本著名的“共性”（consensus）了，这种“共性”意味着政府、各派政党、工业领导人以及所有老百姓都将经济发展看成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并对达成这些目标的手段，具有共同的认识。有些词已用来形容日本的文化凝聚力，例如：“柔韧的共性”、“个人集体主义”、“天生的集体主义”、“无蜘蛛的蛛网”以及“日本公司”。

我认为，这些解释有点一般化，而且不够严谨。共性固然对日本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并不是天生的。鲁思·本尼迪克曾经认为日本共性是由于环境，诸如发展落后、资源短缺、对贸易的需求、国际收支限制造成的。事实上，将一切都归于“共性”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大半时间里，日本人并不团结），这种说法也忽略了政府和其它因素造成的效果。戴维·泰特斯研究了战前日本帝国政府“私人性”而不是“社会性”的作用，让我们了解了日本的“共性”问题。

本书稍后将用许多案例表明，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政府怎样运用更为成功地“引导”民间与之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战争中的直接控制方式。也许最终的分析会发现，日本人的价值观确实与西方人不同，但这需要研究，而不能只是提出，我们必须先用经

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这些行为模式上的分歧，不能解释的，才归于其价值观等因素。确实，当经济奇迹仅仅在日本出现时，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奇迹很是流行，但当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也出现经济奇迹后，文化差异解释法也就失去了市场。

第二派研究者不承认出现了日本奇迹，他们认为，所发生的只是市场力量的正常成长。此派代表人物之一休·帕特里奇指出，“我们这派对日本经济成就的解释是，日本的成就应归功于广大民众和私人企业的努力，他们抓住了自由市场对商品和劳动提供的机会。当然，政府也支持了他们，给他们提供了发展的良好环境。政府虽也有功，但不宜过份夸大”。但是，他也承认“对战后日本经济成就的解释并不成功，因为从劳动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设备来估计，至少有40%的产量增长和一半以上生产力的增加无法解释。”假如能够表明政府的产业政策对现实经济中的战略工业投资率确有影响（比如象日本的石化和汽车工业的成功），那么，我们就认为，日本政府对日本经济奇迹的贡献并无夸大。这点在后边将加以讨论。

许多日本人都驳斥帕特里奇关于日本政府除了对经济增长提供了环境，别无所做的说法。前任通产省事务次官的佐桥滋坚持认为政府对于经济是尽责的。他说：“认为政府只是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不去告诉民众如何利用这个环境，这是生意人一厢情愿的想法。虽然企业界偶然也反对政府的引导，但这毕竟并不多见。”

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来讨论日本经济，往往只是假设，忽略了分析。例如，人们认为日本这个发展导向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和美国这个规则导向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是基本相同的。菲利普·特雷齐斯就说过，日本的政治体制和其他民主国家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其不同只在一个方面，即在预算审核过程中，拨款本身比权威重要。除了1972年在野党压力

下，日本国会削减了部分国防预算外，自1955年以来，国会就没有修改过这项预算，对于其他预算，也从不给予刁难。

日本和美国相比，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即银行制度。在大战前，日本所有的企业资金占有率大约为全国的66%，与美国目前的52%相似。但自战后到1972年，比例已跌至16%。由于大公司都通过银行贷款来取得资金，而这些银行又转而靠日本银行担保，日本银行本身在50年代通过激烈的斗争，成为财政部门干预金融的工具。因此，日本政府对其“策略工业”的发展有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这在市场制度国家中是很少见的。通产省在1974年曾用“计划导向的市场经济制度”（plan-oriented market economy system）来称呼其过去20年采用的措施。“计划导向的市场经济制度”截然标出了与其他民主国家政策不同的地方，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培养了经济奇迹本身。

那些不承认日本经济奇迹的研究者也承认日本的经济成就，但他们坚持认为，这只是资金、劳动、资源和市场相互发生作用，误打误撞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有违于经济规则，因此，所有日本人发明并继续使用的概念，诸如“产业结构”、“过度竞争”、“重点投资”以及“公私合作”等，都不能用。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这些概念最糟糕的是，绝口不提日本政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结果正如约翰·罗伯兹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都在谈论60年代日本所出现的经济奇迹，但很少有人能确实告诉我们，奇迹是如何造成的？是谁造成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对日本奇迹进行研究的第三派强调特殊的组织形态对日本奇迹的影响。这派观点在日本国内外都很流行。简单地说，这派观点是将日本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日本企业家所称道的“三大法宝”，即：终身雇佣制、年资薪金制和企业联合体制。通产省的天谷直弘就将这三大法宝视为日本“大家庭”经济制度的精华。1970

年，前通产省事务次官大慈弥嘉久在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中，也提到这三个独具日本特色的法宝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这三大法宝，使日本劳工更为忠诚，罢工天数更少，创新更为容易，产品质量得到更好的控制，产品优于国外同业竞争者。

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条理欠分明，也过于简单了，尚需补充几点。首先，日本的法宝不仅仅是这三项，它还包括：个人储蓄制度、销售体系、退休官员转入私人企业的做法、工业组织结构（或各产业由寡头企业垄断）、双重经济制及随之而来的转包结构、税制、股东决策权的缩小，以及最重要的，由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日本开发银行及其由政府控制的活动——投资和融资。

细述上述各点是不必要的，因为大多数大家都很熟悉。某些构成政府影响和引导经济的规章，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些规章，形成了日本的体系，这种体系并不是任何人或机构能设想出来的，而是在日本面对工业起步晚的形势下，在政府重视工业增长的政策下，必然的结果。将这些规章汇在一起，它们就成了推动经济前进的火车头，用美国人的话说，这是一个“GNP”机器，但若将这些规章分开来看，有许多都不合理，因此，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否则就会失之偏颇。

让我们举例说明，由于日本的成功，有些美国大学里的管理学科教授，也向本国的工商企业推荐日本的“法宝”，有些经过修改的规章，施行起来效果不错，但是一位美国企业家采用了终身雇佣制，由于没有其它日本规章的配合，他很快破产了。终身雇佣制在日本并不是真的“终身雇佣”，而是雇佣到50岁左右。虽然工资的增加和工龄挂钩，但是工作的保障也随之降低，因为工龄越长，工资越高，一碰到经济不景气，就首先被开除。临时

雇工也无法享受终身雇佣制的福利，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处于这种境地。临时雇工在企业里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在60年代，丰田汽车公司约有42%的雇员是临时的，这种比例是美国任何工会都无法忍受的。

就算美国企业家能解决以上问题，但一碰到经济不景气，也无法象日本人那样利用组织的弹性，化险为夷。富冈隆夫将日本的转包商称为日本商业循环的“缓冲装置”(shock absorbers)，这种转包商减轻了不少大企业的劳动成本支出，缓冲了不景气对大企业的冲击。从另一方面看，日本的分销系统显得过于庞大，但却可以在经济萧条时吸收大批失业劳工，美国的劳工就没有这种保障。1968年，日本的批发货物转手的次数是零售的4.8倍，同年美国的比例仅达1.3。尽管许多外国销售者抗议这种做法，但有脑子的日本人却并不想有所变化，因为这种制度能减轻企业负担失业保险所带来的重税。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优点很多；它刺激雇主充份利用现有生产设备与人力；抑制了全面的劳工工会运动。用大川一司和罗索夫斯基的话说，这种制度给企业提供了“顺从的劳工”，这些劳工不会反抗任何技术或组织上的改进，即使这些改进会导致裁员。尽管终身雇佣制有这些优点，它却不能离开其他“独特的规章”而单独存在。

这些特殊规章的第二个特点是其产业的背景和运行方式。这派人的观点和第一派人的观点相似，也认为日本的文化和日本的国民性推动了日本的经济。例如：天谷直弘就将“三大法宝”追踪溯源于传统的家、村、国，他相信，现代企业仍继承了这种传统精神。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说法往往只是日本用来堵塞外国批评的借口，日本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大量研究表明，这些所谓的独特制度，都起源于本世纪初期，不会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例如，终身雇佣制，追溯到以上，溯到第一次大战后，

日本社会为抵抗左翼社会改革运动所采取的措施之一：二十年代，大量的朝鲜和台湾劳工进入日本，促使日本工人不惜任何代价以寻求工作保障；战时的军火商为了留住熟练工人，也纷纷采用终身雇佣制。研究日本产业主义的权威R·P·多尔（Dore）认为：“1900年，日本的雇佣制和英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相似，在以后的20年里，日本进行了组织创新，在30年代，完善了原由家族为主的企业，40年代，为了适应工会力量，对制度作了调整，这就形成了今天所谓的“社会福利合作主义”。

中村隆英发现日本有一连串重要的规章起源于战时统治时期，这包括以银行为中心的企业集团和转包制度，虽然这些转包制度在战前就已存在，但是通过战时政府强制将中小企业与大机器制造商合并，更加强化了这些制度的机能。

政府还采用几种方法来影响这些独特的制度。许多制度都是在30年代的“产业合理化”运动或太平洋战争中直接产生的，有些制度虽然不是由政府直接创立的，但政府为了自己的目的，认识到了它们的作用，间接促使了该制度的产生，储蓄制度就是一个例子。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家庭储蓄额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和平时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是最高的；其解释为，日本人生性节俭。但也有许多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日本人储蓄，比如，社会福利制度不够完善；一年两次的巨额薪金红利制度；劳工在60岁以前大量扣除薪水以作退休金的制度；昂贵的房地产；为子女上大学所必须筹备的准备金等，这些都需大量储蓄。此外，日本的消费账卡制度并不发达；政府经营的邮政储蓄制度利息很高；亦缺乏良好的资金市场，无法吸收民间资金；还有银行利息免所得税的做法，都是日本储蓄率高的原因。日本政府十分了解这些促使人们储蓄的原因，事实上，进入邮政储蓄的钱，直接就拨入了大储蓄，再根据政府的需要，作再投资用。民性节俭固然促进储蓄，但政府如何努力利用这种民



性，很值得我们研究。

第四派人的理论是“搭便车”（Free ride）。他们认为，日本是战后美日联盟的受益者，至少对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是这样。日本享受“搭便车”之益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表现：无须负担庞大的国防支出；可以进入广大的美国市场；以低廉代价取得技术转移。

日本确实不用将其国民收入投在国防军备上，但此事并不影响经济的高速增长。假如日本的总投资率象中国那样低的话，那么国防上再少的开支都会影响经济发展。但是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资本形成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所以，国防开支的高低对经济的影响并不重要。以南朝鲜和台湾为例，他们也象日本那样施行高投资政策，但事实证明，他们大量的军备支出对其经济发展并无太大影响。

日本的出口贸易也需重点分析。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确实从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中获利甚多，日本政府官员也一再承认别国所设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IMF）和1971年停止的固定汇率制度，使他们受益非浅。实际上，日本人也有悲观的一面。通产省的官员就曾以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的经济成就，他们认为日本经济的飞速增长，主要在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45至1970年两个时期。他们担心从70年代末期开始，他们又会回到1920至1945年的增长缓慢时期。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日本的经济增长与其说是依赖出口，不如说是归功于国内市场的开发。以人口计算，日本的国内市场有美国的一半大。埃莉诺·哈德利指出，虽然在60年代早期，日本的经济规模约为1934—1936年的3倍，但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仅是30年代中期的 $\frac{1}{2}$ 。日本60年代晚期的出口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6%，同期加拿大为19.8%。1953年至1972年，从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率来看，日本对进出口的依